

关于黄埔军校的一段回忆

卞稚珊^①

欣逢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回顾历史，不禁感慨万千。我作为辛亥革命烈士卞小吾的后裔，特别对辛亥革命之成功来之不易感受最深。

吾父卞小吾烈士出生于封建家庭，卞家在明朝是四川江津县的十大姓之一。但他背叛家庭，开始革命，则是得助于明末黄梨洲学说的核心——“君为天下之大害”的启发。而革谁的命？他接受了孙中山在中法战争失败后立志“倾覆清廷，建立民国”的理想。如何变理想为行动？又是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吾父入京亲眼看到清廷的腐败，令人绝望，只有革命，才能挽救危亡。至于应当采取怎样的革命行动？直至吾父南下到沪，适震撼全国的“苏报案”发生，曾三次就狱，与邹容、章炳麟密商继续革命的道路，始实践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效法陈梦跋捐资接办《苏报》的办法，于一九〇四年返川，毅然毁家创办四川第一家《重庆日报》，积极宣传革命。渝中同志、沪上党人都认为它是西南一支革命劲旅。《重庆日报》曾报道慈禧在颐和园的骄奢淫逸情况，标题是《老妓在颐和园的淫行》。四川总督锡良抓住此事，认为这比《苏报》骂光绪是小丑更为大逆不道，罪该万死。于是镇压革命的矛头直指吾父，

^① 卞稚珊现为四川省江津县政协副主席。

于一九〇五年将他逮捕。适同盟会在四川成立支部，传来了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吾父闻讯，更坚定了信心，不因失去自由而放松斗志。在成都科甲巷待质所三年，著有《救危血》、《呻吟语》、《应世南针》等诗篇，酣畅地抒发了自己高尚的情操和凛然不可侵犯的革命风骨。

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五日，川督锡良喉使狱吏，伙同狱卒用匕首刺死吾父于狱中，吾父身受七十三伤。越三年，辛亥革命成功，吾父之血并未白流。江津县志主编、邑人刘泽嘉对此有感曰：“君与邹、章交好，受祸亦同，而惨烈过之，乃事有闻有不闻。悲夫！余悲其志之不伸，而饮恨以死。甚矣！”盖指此。又江津长联巨子钟云舫氏著《振振堂联稿集》记载他同吾父先后被冤羁成都待质所者三年，幸得逃亡，后闻吾父噩耗，怆然挽之以二联：

“何事恼穹苍，竟碎荆山。黑暗界詎发文字光。这千年沉渊堕海之冤，化为白气冲霄汉；

“同时遭叵测，幸逃军府。金石人熬尽风波狱。余一把呛地呼天之泪，洒向朱棺涌血河。”

“谁使君到此间。起兹平地风波。似这般铁血横飞，万点蜀山，胥化其宏之碧；

“吾与子遭斯祸。已抱呼天冤愤。詎复料金銮颁赦，三声猿泪，竟残巴曼之尸。”

民国成立，四川军政府特追赠吾父以“辛亥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我以革命后裔被保送至南京孙中山、黄兴创办的“忠裔院”读书，时年十三岁。历经几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变革，而今已八十八岁了。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不久，孙中山根据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马林提出的建议，于一九二四年创办了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产

物——黄埔军官学校。他在该校第三期开学典礼训词中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这个原因简单说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成功。”又说：“我们今天要办这个学校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开始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成功。”

军校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开学后，到十月份第一期还未毕业。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即组织黄埔学生军和一部分革命军前往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一九二五年二月开始的东征陈炯明战斗，也是以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为主力。六月间又将这支学生军撤回讨伐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叛乱。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紧接着又于八月下旬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将粤、桂、湘等小军阀军队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各军中多由共产党人任党代表或担负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改造了这些旧式军队的雇佣性质。特别使我难忘的是，蒋介石在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就开始了排除异己的活动。十月三日，蒋介石、汪精卫合谋将孙中山生前特任的讨贼联军（后改为建国联军）前敌各军总司令熊克武、军长余际唐、师长喻培棣等设宴诱禁于虎门要塞。这支部队的三万多革命劲旅（包括刘伯承指挥的第二混成旅）秉承孙中山之命假道湘西，出师北伐，在全军进抵湖南常德时，适逢孙中山先生逝世，乃回师广东革命根据地，经过湘、黔、桂、粤四省交界的崇山峻岭和地瘠民贫的地区，历时一百三十多天，行程万里，久经沙场锻炼，竟因群龙无首，致使不幸瓦解（贺龙所率一旅，因留公安、石首一带未随军前进，得以幸免）。蒋介石派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二军

谭道源师长率部来粤北企图强制收编，未能得逞。随又派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李岳阳任教导团团长，曾扩情任团党代表，到连县收容队伍。因李原系石青阳部的骑兵团团长，后保送去黄埔学习，与我有同事关系，当将我率领的建国联军干部随营学校部分学员和全军的伤病官员近千人交该团护理。同时朱培德邀我任第三军军官学校步兵科长，后并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蒋介石诱禁熊克武，瓦解其全军后，又进行了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的战斗。直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占领海南岛止，广东全省才完全统一。

为了继承孙中山遗志，结束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局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国共两党同心协力举行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广州革命政府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发表了《北伐宣言》，随即派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不到半年时间，就解放了半个中国。

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公开违背中山先生的意愿，完全推翻了三大政策，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在政变的前一天，蒋介石就密令在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这是政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在黄埔军校任第五期步兵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中校队长。当全校师生正在为频频传来的北伐捷报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不料，在平静的黄埔岛上，竟传来难以置信的消息。黄埔军校海军码头到广州天字码头的例行班航突然停止了；每星期六晚上利用“血花剧社”演出文艺节目的间隙时间进行宣传教育的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韩麟符等同志突然不来了。大家对此深以为怪。军校中平时常有争论的两个政治派别——代表共产党学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代表国民党右派学生的“孙文主义学会”，这时反而沉默起来。这些迹象，不能不使人感到扑朔迷离，无从揣测。我们这些带队军官，则以为军校是两党共同领导的教育机关，不管时局怎样变化，对我们都无多大关系，唯一的职责就

是把学生带好，照常上课。

四月十五日凌晨，突闻紧急集合号音，我从梦中惊醒，还以为举行夜间演习，只是对大队部不照往常那样事前通个气而感到奇怪。不到五分钟，全大队官生都齐集操场，站成训话队形。这时已渐出现曙光，我们才发现在我们蝴蝶岗营房对面的小山上，人影幢幢，隐约可见埋伏的军队，枪口正对准我们。就在这时，大队长肖钟钰从校本部方向急步走来，等到队伍清点人数后，他立即郑重宣布：“奉校长蒋中正电令，黄埔军校着即进行清党，并将划清国共两党界限情况，迅即上报。”随即下达命令：“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应自行站出来。”话刚说完，仅我第六中队（每中队二百名学生，全大队辖四个中队）就有二十五人毫无惧色地应声而出，全大队站出来的共一百多人。紧接着肖钟钰又厉声宣布：“隐瞒身份不站出来的，可以互相检举，有一人检举，二人附议的都应站出来！”我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两党官生身份基本上是公开的，而且两党党员有的是交叉的。”为了避免“清党”扩大化，我建议必须一人检举，几人附议。我这一建议提出后，再也没有人检举了。已站出来的学生，随即由四周担任警戒的特务营将他们武装押送到预设烂石头炮台和珠江的船上拘禁起来。我亲眼看到一手培植起来的学生惨遭迫害，生死难卜，又无力援救，只有在生活上、精神上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次日我即命司务长黄鋆将被拘押学生的伙食津贴、衣物书籍送去。后闻这批被清洗的共产党员学生，是由第六期入伍生看守，因出于同学同志情谊，有的同学被放走，有的乘隙逃走，也有的被沉入珠江杀害，最后交给广州市公安局关押的还有二百多人，直至是年十二月广州起义时才被释放出来，参加起义。在黄埔军校“清党”的同一天，广州市内也发生了反革命事件，被逮捕和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达两千多人，包括

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肖楚女等人。至此，中山先生倡导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完结。

黄埔军校自“清党”后，已失去了革命灵魂，校内除少数“孙文主义”分子外，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已经绝迹，其余都是惊弓之鸟，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一党手中。之后不久，蒋介石来电调第五期学生（包括武汉分校学生）到南京参加自己亲自主持的毕业典礼。我们由海道乘轮前往。这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将第五期毕业生分发后，学生们即参加了龙潭战役，我奉命回黄埔军校接收第六期入伍生升学。校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仍由蒋介石、汪精卫、邓文仪分别挂名。当时广东的实权掌握在第八路军总指挥兼黄埔军校代理校长李济深手里，他派第三军军长李扬敬兼教育长主持教务，何彤任办公厅主任，罗植椿任训练部主任，肖钟钰调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长，邓挥任炮兵队长，郑彬任工兵队长，皆驻校本部。我升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长，下辖吴刚、白肇学、陈明仁、陈长捷等中队。驻离校本部约二华里的平岗。学生来源除了郭大庸、李亚芬所率两团入伍生照例升学外，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办农业训练班的学员约六百人也并入第六期肄业。与此同时，还将原学生军进行甄别后，编为第七期入伍生，驻燕塘。经过一番整顿，到十月初才正式上课。

当时占据广州的国民党军阀张发奎，把大部分兵力调去争夺地盘，广州空虚。隐蔽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叶剑英，为了争取黄埔军校领导权，遂于同年十月下旬率张发奎第四军的一个营，由教导团（共产党员杨树松任团长）中原第五期被清洗出去的共产党学生引路打先锋，强行提取了位于校本部与平岗之间的鱼雷局军械库所存放的枪炮弹药。他们一登陆即同驻在校本部的步兵第一大队学生发生冲突。这批打先锋的学生对肖钟钰在“清党”时毫无

一点师生感情表示愤恨，要找他算账。结果，李扬敬、何彤、罗植椿、肖钟钰、邓挥、郑彬等高级负责人都在混乱中弃职潜逃。

当时我驻平岗，师生们正在上课。突闻校本部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原因不明。这时电话已断，与校本部失去联系，有谣传说土匪抢枪。我感到护校有责，遂紧急集合全大队教职员生约二千人，就内操场坐下，避免流弹伤人。由于刚刚开学，每大队只发步枪五十支作警卫之用，其余全部枪炮都存储在鱼雷局军械库。我立即同中队长吴刚、白肇学各率两班精干学生，分别扼守在通向鱼雷局的桥梁、右侧倒吊葫芦和正面操场山岗上。由于学生初临实战，一进入阵地就打响了。互相射击十来分钟后，白肇学左手和一朝鲜籍学生腿部分别负伤。这时我才发现对方后续部队整齐，始知是正规军而不是土匪，遂吹停战号，双方开始对话。对方来人自称是张营长，黄埔三期生。误会解除后，他要我们照常上课，但三天之内不能通过鱼雷局。三天之后，对方撤去警戒。后来我才证实，戒严是为了把军械库存储的万多支步枪、二三百挺机枪、几十门大炮连夜运走，为“广州起义”作准备。

此时的黄埔军校因李扬敬等擅离职守，已成真空状态。张发奎随即派杨树松接替教育长职务，教导团的王侃予（原建国联军干部随营学校学员）接任校办公厅职务，教导团的宋香涛（同我系保定军校八期同学，已参加共产党）接任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长职务。同时在各中队派共产党员担任指导员。我因坚守岗位，资历又深，故仍征求我的意见，留任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长。这时的黄埔军校领导权又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大部“孙文主义”分子见大势已去，恐于己不利，都纷纷撤离职守，中队长陈明仁首先潜往南京向蒋介石告密，蒋遂升任他为大队长，负责收容北上学生在杭州集中，并入南京军校第六期。

从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六日起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清党”止，是国共合作的时期。从“清党”后，到杨树松接管黄埔军校前，这段时间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里。又由杨树松接管黄埔军校起，到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广州起义失败止，这段时间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这是黄埔军校有史以来的创举，是广州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州起义失败起，到一九二九年底第七期毕业时止，所有教职员工全部调到南京中央军校，只有少数人调到燕塘军士教导队。轰动一时的黄埔军官学校，就这样完全结束了。

至于在广州起义中，既然黄埔军校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为什么除了全校共产党员和特务营参加了广州起义，而几千学生没有参加呢？原来，在广州起义前一天，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广州城宣布了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拘捕了許多人。消息传到黄埔岛上，引起了全校师生的窃窃私议。十一日凌晨，距离广州市约四十华里的黄埔岛，突然听到广州方向有密集的枪炮声，并看到火焰直冲云霄。我打电话同校本部联系。答复是：“要维持好秩序，照常上课。”尽管我向官生不断地作了精神讲话，但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种种迹象，不能不使人疑虑丛生。王侃予即邀我到校本部开紧急会议。决定：（一）责成大队长卞稚珊以校总值星官的名义和职权，督率全校教职员生照常上课、上班；（二）特务营另有任务，所遗警卫工作，由各大队各选学生五十名，听候校总值星官统一指挥；（三）经理处负责预支各单位十天经费，备足十天伙食；（四）特务营到达广州后，再派人联系。随后王侃予、宋香涛、缪云人等共产党员率领特务营全副武装，以急行军态势，在海军码头乘轮渡江，向瘦狗岭方向前进。不料，他们此去就不再返回。事后，我才明白他们此行是参加了广州起义。而

几千学生来不及同他们一致行动，其原因是：（一）“清党”后的政治部主任由“孙文主义”头子邓文仪担任，大家对学生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也还没有完全摸清楚；（二）自从“清党”之后，师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几乎绝迹，仅凭新来的少数指导员做政治思想工作，还需要一段过程；（三）由于陈明仁带头一走，在杭州公开收容北上学生，使学生动摇起来，再加李扬敬在学生中闹不团结，造成中央与地方之分；（四）存在军械库备学生训练的枪炮早被提走。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没有能参加广州起义，但这绝不能因此而抹煞从共产党组织派杨树松等同志接管，到广州起义失败以前这一段时期，黄埔军校领导权一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光荣史实。

一九八六年初夏